



澳门丛书

A o M e n S h i L u n G a o

澳门史论稿

◎ 韦庆远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门丛书

A o M e n S h i L u n G a o

澳门史论稿

◎ 韦庆远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门史论稿/韦庆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6

(澳门丛书)

ISBN 7-218-04948-6

I. 澳… II. 韦… III. 澳门—地方史—研究
IV.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427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1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948-6/K·97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1753)联系调换。

前言

一

本书是从本人近年所写有关澳门史的论文中选载出来的，共收文章 12 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 12 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清王朝制订管辖澳门并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的政策，以及对之不断调整的过程；对仍受恩准租住澳门葡萄牙人的实在处境，以及他们对清朝“恭顺”和“效忠”表态的剖析；澳门得以形成中外交通中心和东西文化交汇点的条件和原因；澳门开海贸易与内地经济的互惠和矛盾；东西文化交流的互补和碰撞；鸦片战争之后澳葡当局对中国反恭为倨，不断侵权扩界，企图永据的表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澳门问题的干预；澳门沦为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黑窟的背景和危害；光绪十三年（1887）《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出笼，葡方因而取得“永驻澳门及其属地”的侵略权益，以及中国朝野的持久抗争，等等。

澳门历史的独特发展涉及的方面极广，它不但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内政和中葡关系，而且早就陷入复杂的国际关系漩涡之中，受制于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既剧烈而又异常复杂，绝不是区区十余篇文章所能透彻阐明的，本书不过是对以上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二

我之所以在近十多年来将澳门史作为研究领域之一，有两



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由于个人和澳门存在过一定的历史渊源。

1937年，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由于当时居住的广州市受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而且日军在广东登陆的威胁日迫，父母为逃离战祸，带着我移居澳门，在当地上小学和升入初中。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了香港，澳门极端困难混乱，陷于风声鹤唳的状况之中，学校根本无法正常上课，我才随几位年长的同学从三水县卢苞水闸封锁线偷渡入“抗战区”，继续读书。到1942年年底离开澳门，旅居那里共有五年之久。这一段时光，正是自己从儿童发育为少年、知识渐开的时期。澳门半岛不但傍山临海，风光秀美，给自己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的澳门虽然处于葡人管治之下，但当地居民关心抗日战争，群众性的反日爱国热情高涨，各种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记得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的消息传到澳门，人们奔走相告，当晚全市通宵达旦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胜利，充分表达出敌忾同仇的爱国情绪。当时澳门不少青少年自发地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也有人奔回内地，请缨从戎。在澳门的抗日街头剧和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风起云涌，深入到校园和街巷之中。小学生们放学晚饭之后，往往便群相走到街上与年龄相近的少年一起排队巡游，同唱抗日歌谣，直到歌罢尽兴才回家做功课。我上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梁寒淡先生给我们选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范文，他在讲解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句，联系到现时国家正在反抗外寇侵略，澳门又受葡占的情况，不觉声泪俱下，引起了课室内全体同学都放声痛哭。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记，使我受到老师、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卫国忧时情操的感染，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离开澳门之后，这些情景仍然记忆犹新，终生难以忘记。对于这个远在祖国南疆的美丽半岛，我常萦魂梦，怀有同于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时涌起重回故地的愿望，“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①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①（唐）岑参：《岑参集·早发马署怀终南别业》。

长期所愿难偿，“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①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至 90 年代，由于拨乱反正，实施了开放改革的政策，也由于将澳门收回祖国已列入议程，我先后受到澳门基金会、澳门日报、澳门大学和澳门档案馆的邀请，多次回到澳门访问和讲学。50 年后赋得归来，自然引起强烈的兴奋、怀旧和沉思。我多次沿着当年上学的旧路踽踽漫步，总希望重新捕捉回当年欢欣的童心；我也曾有幸重逢当年同窗共读，日夕一起欢笑歌唱的童年游侣，当年的少男少女，而今都是白头翁和白头婆了，纵使彼此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但握手唏嘘，“相悲各问年”，仍保持着极其真挚的故旧情谊。我们还准备了香花清酿，相约到西洋坟场悼念长眠于此地的另一童年好友。献花酹酒，无非是对往昔无邪岁月的回望，对当年真挚友谊的追思，所有这些，都是自己灵性中的珍藏。

更可喜的是，在澳门还结识了不少长期坚守在当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朋友。即使在葡人管治时期，澳门也绝不是文化的沙漠，确实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着重在研究本地历史方面默默地耕耘。他们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尚，笃守求真务实，已经建成一支实力可观的队伍。前贤后学，济济一堂，成果丰硕。我很为他们知识渊博和学风扎实所感染，每每疑问讨论，很受教益。喜在故园逢故侣，乐从新域结新知，充溢着欣喜和仰慕之情。作为澳门原居民，我每次回到澳门，都在学术上和友谊上获得丰盈的收获，更加深了对这片热土的感情。

最值得引为欣慰的是，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从而结束了四百余年来被葡萄牙人从借住到租住又到侵占的历史。澳门的历史发展是世所罕有的，它有过耀眼的辉煌，有对世界经济和文明发达作出过的重大贡献，但它又曾经饱受损害和屈辱，被迫藏垢纳污，成为罪恶的渊薮。但最为本质的是，历代的澳门人民，总是坚持民族自尊和恪守道德伦理，对各种罪恶污秽进行坚决的抵制，对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各国侵略势力，一直坚韧地进行反抗，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在祖国人民持久的支持下，

^①（宋）柳永：《八声甘州》。



在反迫害反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一再力挫凶焰，力拒邪恶，克服困难。澳门史是中国明清史、特别是清史和近代史一个重要的分支。澳门的兴衰荣辱向来是和祖国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只有祖国强大，澳门才可能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奴辱和羁绊，终于取得回归祖国的伟大胜利，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澳门恍似是一尊饱经劫难，但终于冲缺炼狱，巍然屹立的不朽金刚；又更像一只浴火重生的金凤凰，它正在腾跃而起，翱翔于天际。

历次在澳门，不少师友都提到，对澳门数百年来独特发展而且错综复杂的历史，理应进行认真切实的研究，并且都殷切鼓励，希望我能参加这样的学术工程。故国情，求知欲，促使我愿竭绵薄。

三

促使我着手进行澳门史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二十年来，有关澳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卓有成绩，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历史学是研究既往史事的科学，它是以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述被称为史料。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史料残缺或薄弱，也难以写出有理有据的信史。以中葡学者为主，对澳门历史的探讨，其实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开始了，但往往偏执于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情感和利益，更因受限制于掌握的史料片面，断编残简，难以有力说明问题，很难写出持平公正、具体、翔实而全面的著作。澳门史在许多关键性的地方确实存在着各执一端，各持一说，自弹自唱，难得共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来龙去脉不清，真相一时难明，染苍染黄，难有定论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大多数反映当时行为活动的原始记录未有公开，缺乏真凭实据以作定论。学者们久久盼望，中葡以及其他有关各国，都能将关于澳门问题的历史档案公布出来，俾得解疑纠错，澄清混乱，有利于澳门史研究的开展。

近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首先是中国两岸三地（大陆、台湾和澳门）的档案和学术单位相继整理和公布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有关澳门的历



史档案和文献资料。这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的。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一书陆续分册出版，是这方面的奠基巨构，这部《史料汇编》虽然是以登载华工出洋资料为主，但其实也包括有大量有关澳门社会、中外关系和“苦力贸易”的中外文档案文献和著述。到 90 年代中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澳门专档》一书，全面公布了自清末咸丰十一年（1861）到民国十七年（1928）为期共 60 余年，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北南两政府外交部有关澳门交涉的档案，这是两岸间第一部编纂定稿的有关澳门专题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其学术价值很高，影响也很大。之后，在 1999 年，又连续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这本《汇编》公布档案的时间跨度很长，始自明天启三年（1623），止于清宣统三年（1911），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澳门的满汉文档案，还刊载了明清时期中国以及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与澳门有关的文献资料，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大型资料书。由澳门档案馆高级技术员刘芳编辑，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校注，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保藏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亦于同期出版。这是一部具有特点的登载着清代中国广东地方官府与澳葡当局因公务往来的汉文文书汇编，由于其原档在国内已经失传，因本书的出版，才便于准确了解当时双方交往的真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葡关系资料集》，收集的文献始自明代正德十二年（1514），至 1987 年中葡两国签订新条约为止，涵盖了 473 年的历史。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收录了大量葡英等国的档案译文，可以和国内资料相比对。以上几部大型资料书，再加上相继出版的若干本较小型的文件汇编、个人文集、地方志资料、诗词文学作品，以及以葡萄牙为主的各国有关档案馆藏和学术著作译文。粗算一下，近年推出以档案为主的有关澳门史料，当在二千万字以上，它们是极好的资料基础，是前辈学者难以期望能够全部掌握和利用的，当然大有助于澳门史的深入探索。



我个人是在细读这些史料中，加深了对澳门史许多问题的认识，纠正了一些错谬和模糊的见解，也激励起参加澳门史研究的信心。

作为澳门史研究队伍的一个志愿兵，深感到在这一项目中可开拓的空间很宽广，可供选择的题目很多。要写成一部高质量的澳门史，必须群策群力，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完成。近年承有关单位和师友们的厚爱，委托我为有些资料书及有关澳门史的著作撰写序言，我深知力不胜任，曾多次婉辞，未获同意，只好硬着头皮着手写作。十分感谢他们的信任，更感谢因此给予我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在书籍出版之前便有机会通阅全稿，认真体会和思考。我的工作习惯是，凡答应撰写序言或书评，必先细读全稿才着笔，总希望在阅读中能领会到书稿的要旨和精髓，也希望能启发开自己的思路，摸索出一些心得以反映在序言和书评上，能为读者增加对原书的理解，亦不辜负原编者和原作者的委托。我甚至奢望自己撰写的一些序言和书评，能够与原书交相辉映，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论文。当然，我也深知，这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志大才疏，力有不逮，要结合写成具有分量的论文，必须投入认真的思考和艰苦的劳动，才可能勉强交卷，目前，仅是一种方向性的愿望而已。在这本拙集中，其中有几篇文章就是在原序文和书评的基础上稍加增补而成的，我试将它们收载在拙集内，目的是希望师友们严加审正，赐予批评。

2004年甲申立秋之日

于广州师凿书室

目 录

前 言	(1)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1)
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48)
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76)
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91)
澳门通洋贸易和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116)
《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131)
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对《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的评介	(143)
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为《(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 中文档案汇编》写的序言	(185)
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 ——为广东省档案馆辑刊《广东澳门档案史料 选编》写的序言	(196)
青山遮不住 ——为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写的序言	(203)
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211)
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229)
韦庆远教授主要著作目录	(261)
后 记	(263)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清初顺、康期间的禁海和迁界，有其特别的背景，是在特定地区严厉执行的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关系到北至天津，南达海南琼州，联结北直、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又以江、浙、闽、粤四省为重点，关系着沿海千百万人民的生存和生计；关系着当时清王朝与海上反清势力激烈斗争的成败；反映着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6—1683），近三十年国内敌对营垒持久反复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兴衰，终于无可避免地归于统一；也反映着因禁海和迁界，与一些外国势力，诸如荷兰、葡萄牙、英国等出现过纵横捭阖的特殊联系和矛盾冲突。界墙内外绝非隔绝凡尘的净土，而是交织着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汇合点，是水陆炮火轰隆，攻防一再易手，厮杀声不断的火线，是军事、政治、贸易斗争的聚焦处。与此同时，又是一些特权官僚阶层，奸商狡佞们利用极好机缘，大发横财的福地。

笔者不揣鲁钝，谨根据现存历史档案和中外文献，对以上问题作粗浅的论析。

一

出现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显然是由于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宣布代明而兴之后，在清朝军力尚未达到的地区，明朝的宗室、文官武将以及当地的人民，纷纷树起“反清复明”的旗



帜。但在满洲铁骑的追击扫荡下，由不同亲藩称帝的弘光、隆武、绍武等几个南明小朝廷相继被扑灭，只有称号监国的鲁王朱以海由重臣张名振、张煌言扶持入海，依靠崛起于东南，统领强大水陆军队，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暂得栖息于舟山。另一受明大学士瞿式耜、督师何腾蛟等拥立于肇庆，年号永历的桂王朱由榔小朝廷，在清军强大压力下，辗转逃奔于粤、桂、湘三省之间，其后在溃败之余，性命难保之际，被迫接受大西军首领、自号秦国主孙可望的庇护。

遍及南北，名号各异的反清组织，经过七八年严酷战争考验，绝大多数已被清军击灭或迫降，硕果存下来的只有两个仍各自拥有强大武装实力、仍坚持着“复明”纲领，和清军进行大规模激烈战斗的营垒。

第一个是以保存着大西军留存之强大兵力为骨干，据有云南、贵州作为稳定后方，势力及于四川和广西一部，以孙可望、李定国为首的西南反清集团。

第二个是在顺治二、三年间（1645—1646）崛起，以郑成功为首领，联合退入舟山，由大臣张名振、张煌言统率的鲁王余部，广泛发动沿海抗清人士，迅速扩大力量的东南反清集团。

这两个反清集团在顺治十二年（1656）以前，势力相埒，东西呼应配合，又各自进行着艰苦的大规模战斗，俱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两个抗清集团都有过辉煌的斗争历程。

但顺治十二年以后，西南抗清集团即开始从极盛走向颓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连遭挫败，更重要和不幸的是发生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内讧，孙可望随即降清并将西南虚实尽数出卖。李定国在清军吴三桂、卓布泰、罗托等三路夹击下突围西走，在云南永昌、腾越一带坚持抵抗，并力图救出已退入缅甸的永历君臣，但未得手。其后，永历及宫眷等被缅甸人逮交清军，随即被吴三桂缢杀于昆明。李定国屡战屡败，终于在滇缅边界的猛腊悲愤而死。从顺治三年到康熙元年（1646—1662），西南抗清集团共坚持了16年，至此完全失败。

东南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集团与西南有所不同。郑成功初起，受隆武帝赐国姓，授招讨大将军印，镇守闽赣边界的大定



关。顺治三年（1646），他坚拒随其父郑芝龙降清，“密带一旅遁金门”^①，当时率众不及千人，但因他的坚强意志和鲜明的反清立场，受到郑芝龙原辖官兵、海上枭雄和复明人士的拥护，三四年间，即拥兵四五万人，继又扩展为十万。由于旗帜鲜明，运用策略和战略得当，相继兼并了其他地方势力，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威震海上^②。他分其兵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积极谋进取。他先后派兵出击，一再挺进入潮州，连陷同安、漳浦、诏安、南靖、平和、海澄、长泰、漳州、进围泉州，兵锋及于长江，积极准备北伐南京。郑成功用兵凌厉，水陆协同，出没靡常，进退灵活，使满汉八旗兵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清方派在海岸前线指挥进剿的浙闽总督陈锦就诉苦说：“自江北而至江南以及浙闽，延袤数千里，俱通波涛，倘此剿彼遁，而彼处罹其毒；兵旋复来，而此处又遭其害。在贼踪为飘忽靡常之局，而我兵无插翅飞堵之能，是鲸浪终无恬静之日也。”^③ 陈锦的言论，反映出一种束手无策的消沉无奈。

经过多次交锋，清廷亦知道，以擅长陆战的满汉骑步兵来对付郑氏海上武装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海寇与陆寇不同，洋洋瀚海，无关隘阻塞，乘风乘潮，顷刻百余里；而各营处处当防，寇以大踪合力而来，营以广汛分兵而守”，“沿海镇将易为堵防守御之力，难成捣巢灭卵之功。”^④ 总是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清廷逐渐痛感到，要解决“海氛未靖”的问题，绝非单凭武力可以奏效。故此，从郑芝龙投降入北京开始，清廷招抚郑成功的使节便南来不断，特别在顺治九年至十年之间（1652—1653），更一再通过郑芝龙以父子亲情及在京家属安危胁劝郑成

①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2。

② 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1。

③ 顺治八年十一月，浙闽总督陈锦：《为恭报官兵出洋凯旋日期及沿海会哨事揭帖》，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以下简称为《郑档》），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④ 顺治十二年三月，前任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为察核浙直沿海失事文武官员事揭帖》，载《郑档》，第116—123页。



功归降，又下诏封成功为海澄公，协助郑成功抗清的叔父郑鸿逵为奉化伯，不惜以破格的高官厚爵和重利招抚。在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的招抚书中，甚至还答应对来降的郑成功部队不必改编入旗，不必赴京，“听驻原地方防剿浙、闽、广东海寇，往来洋船令管理”^①。众所周知，当时的往来洋船贸易历来被沿海官吏和海上枭雄视为极大的利藪，清朝本以为以上述逾常的优容宽待和重利为饵，必可笼络招降。可是，郑成功却以不登陆、不奉诏、不受爵，不剃发的态度来拒绝招抚，“其意如山”^②。相反，更大力扩充军队为七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宣布接受永历帝诏封为延平侯的爵位（其后又加封为延平郡王）。更陆续派兵攻袭沿海郡县，收取饷粮，支持和配合张名振等进军吴淞，东南的形势日益严峻。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清左都御史王永吉在揭帖中就明确指出，就全国形势说，最大的隐忧在闽、浙，他惊呼：“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③这反映出，清廷君臣对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抗清势力的惶遽心理，又痛感剿抚两难的窘困。

三

针对郑成功等拒不受抚，而本身又无力在海上制胜，清廷乃决定以申严海禁，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的办法作为对策。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十六日发出敕谕给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申：

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飭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

^① 参见《清史列传》卷80，《郑芝龙传》。

^② 顺治十一年十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郑成功终不受抚事揭帖》，载《郑档》，第108页。

^③ 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为密陈郑成功将为东南大患事揭帖》，载《郑档》，第88—89页。



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飭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①

这份敕諭措辞十分严厉，对禁海防堵的规定十分具体，可见，清廷是掌握了沿海岸线攻防的实况，是不惜采取严刑峻法，不惜举起杀头等极刑以威慑官民人等，以图贯彻实施。

有人认为清初禁止通海是从颁发上述敕諭开始的，其实不然。自前明中叶倭寇之乱起，便三番五次諭禁通海。入清以后，顺治四年（1647）清军进入广东，在所颁《广东平定恩诏》中便明确规定：“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郑成功等高举反清义帜，活跃于海上，清朝的地方军政长官更很早就有针对性地提出，“其海寇则严禁接济，设法提防”^②。再其后，因郑成功坚决拒降，顺治帝命议政大臣密议速奏对策，该大臣等会议后奏复，提出的应对方案之一便是“请敕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③由此可见，“寸板不许下海，厉禁已有十年”^④，顺治十三年六月所颁发的禁海敕諭无非是针对郑成功等利用海上优势反清对策的重申，只是更加强调和更加具体化而已。

① 《清世祖实录》卷 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条。

② 顺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抚张学圣：《为恭陈闽省近日情形事本》，载《郑档》，第 18 页。

③ 转引自史松、林铁钧编：《清史编年》第 1 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1 页。

④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浙江巡抚秦世祯：《为渔户朱云等违禁出海购买国姓旗事本》，载《郑档》，第 166 页。



问题在于，这样的敕谕和部署，是否能起到清廷预期的效果？

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明郑方面对于清方逐步加紧采取的禁海措施早就有所准备，顺治十二年（1655），郑军在撤出安平、漳州、惠安、南安、同安等城镇时，就“令厦门居民搬移过海，官兵家口搬住金门、镇海等处，空岛以待”^①，即妥善安排他们迁入金、厦诸岛，在郑军舰船保护下，挂“国姓旗帜”的船只，还可以继续出海采捕和进行贸易，这对于“以海为田”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当然是极受欢迎的。另外，在安插留在清占地区的潜伏谍报、“内应”、“筹饷打粮”以及保持继续经营贸易的商事系统等方面，也有较细密的布置。

另一方面，在禁海敕谕发布之后，明郑军队自海上的侵扰进攻，反而激增，掀起了前所未见的高潮。顺治十四年（1657）七月，郑军突破封锁，“数万人乘船至兴化、涵头、黄石地方，掠取粮食财货，拆近水板扉梁柱，结筏装载入舟，三日不停”^②，同月，“郑成功部攻兴化，进克台州，清分巡道蔡琮枝、副将李必及府县官以城降。清平南将军赵国祚急报请援”^③。十五年五月，郑军奇袭澄海县城，清军游击刘进忠及知县、典史等迎降。这一系列战役表明，虽然颁发了禁海敕谕，但沿岸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

特别是，郑成功绝未因清廷颁布禁海敕谕而放弃反清复明的理念，他决意及时进军江南，直捣清廷的财赋重地。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他留黄廷、洪旭驻守金、厦，亲率大军十七万，乘船舰数千艘北上，连陷平阳、瑞安，围攻浙江温州，与清军鏖战，引发东南震动。郑成功的战略意图是，先取得浙江为立足点，再挥军攻打金陵。不料，他率师至浙江羊山，在八月间遇到特大飓风，五千余艘船沉覆，八千士卒漂没，成功

① 杨英：《先王实录》；夏琳：《闽海纪要》卷上。

② 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余颙：《莆变纪事》。

③ 《明清史料》丁编，第2册；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1。

的亲眷多人亦溺死，损失很大，不得已收兵移驻舟山。^①

但郑成功并未因受重创而气馁。经过一年的休整和重新准备，在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又亲率大军溯江而上，击败沿江堵截的清军，连克瓜州、镇江、丹徒等重镇，在焦山遥祭明太祖、崇祯帝和隆武帝，全军感泣。进军途中，清军望风而溃。月底，郑军已逼近江宁城郊，连营八十三，“江南北诸城邑多纳款”^②。与此同时，张煌言亦出兵江西，以为呼应，分兵克服了溧阳、池州、和州、芜湖等重镇。当此形势急转，清军屡败之时，清帝顺治惶恐震怒，一度“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③。可惜的是，郑成功因屡胜而骄，不接纳张煌言尽速攻下江宁以为根本的建议，反而轻信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诈行缓兵之计，同意宽限攻城；清苏松提督马进宝虽表面上派人来联系，表示有意率军响应，其实是心持两端，楚胜则楚，汉胜则汉，一直拥兵观望，郑成功亦未保持应有的警惕，反而坐待受降，纵容兵将释戈纵酒，松懈戒备。不意清军早有预谋，七月十五日，以总兵梁化凤为前锋，突然猛击郑军重要营垒，郑军大部溃散，其他散驻于众多山谷的各部，因事起仓促，又得不到统一号令，不能相援助，兵败如山倒，遂至大败。是役，郑军主力损失大半，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所克诸州县尽失，已归降的清将又纷纷反水，郑成功只好收军登舟出海，退回厦门。张煌言孤军独木难支，又连败于芜湖、铜陵之间，也只得焚舟登陆，逃亡于沿海岛屿。姑置顺治十五、十六年两大战役胜败于不论，但可断定，徒恃禁海敕谕，并不能限制海上反清武装的进袭。

基于以上情况，清朝君臣乃密切研究进一步扼制的对策。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即试行将同安的排头、海澄的沿海居民强迫迁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安插，以隔离

①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20；徐鼎：《小腆纪年附考》卷19；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1。

② 归庄：《高士集》卷4。

③ 魏特：《汤若望传》引《汤若望回忆录》。